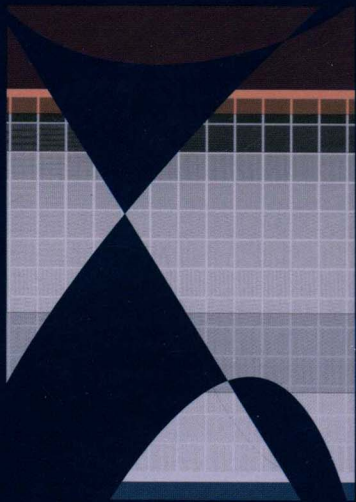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李志雄/著

A Study of Literature Considering Marx and His Culture

基于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学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基于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学研究

李志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学研究/李志雄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49-3179-7

I. ①基…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6278 号

书 名 基于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李志雄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邵 昊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国外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值得关注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就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这种批判,他们建构了一种文化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并将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西方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的引导下,朝着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的倾向。对于这一现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和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则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对人、人性的压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支配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当代西方人被以广告等大众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控制和支配,进而把生存

的全部希望和热情放在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上,同时人们的这种对物质商品的追求并非是自愿的,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由社会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更为可悲的是,当代西方人对这种异化的状态不仅不反抗,反而还沉溺于预期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中。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的统治方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是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但是,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必然使这些许诺最终落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危害,使人从被商品的牵引中摆脱出来。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变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启蒙理性”。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理性”使得技术合理性思想盛行于西方,从而使得曾经使人们从神话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理性”变成了极权主义的神话,并造就了完全充当当代西方社会统治工具的“文化工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则考察了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发展及其当代危害;此外,阿尔都塞、弗洛姆则详细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的。可以说,这些理论路径和研究趋向直接导致日后文化哲学和“文化热”的兴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朝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根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不过,从伯明翰学派诞生以降,这种转向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向,

特别是活跃在欧美理论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一直与 20 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革命”,那么“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的是关心“文化批判”,包括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由于他们的研究紧贴社会实际,因此新一代的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总之,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 20 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潜心于研究现实生活问题。他们的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因为,他们抓住了当今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范畴,他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全面理解 20 世纪后期至当今全球性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美新左派中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研究对我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 21 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 20 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

近 20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研究、讨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是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乃至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

之间的关系。中国理论界也普遍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理论界已经意识到,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视野中,文化研究已经不是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虽然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却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尽管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将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进行观照。

当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理论界兴起的“文化热”,说到底是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理论界普遍意识到了,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同时,理论界还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有学者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指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文学界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

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成果,有些我们已经了解,有些还比较陌生。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伯明翰学派的代表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与词典的本质差别在于对词汇“内在关联性”的重视。为了呈现这种关联性,威廉斯精心编排词汇,在按照字母排序的同时,用“互相参照”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词汇重要的关联,即在阐释词条时威廉斯有意识地将词语与其相关词语进行比照,并把该词放到不同观点中进行展示。与此同时,他在词条后列出“参照”词汇,这种回到词语使用的情境和与其他词语相互对应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之后的文化研究。很多学术后人继承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其中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赛奇维克著《文化理论:关键概念》正是威廉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的延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由于文化研究的综合性特点,也由于我们的知识储备的局限,在文化研究中,我们经常会面对诸多所谓核心话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西蒙·杜林著《文化研究:批评导论》正是由一系列关于这门学科核心话题的短文组成,从电视到多元文化主义,从文化遗产到酷儿政治,作者几乎都有所论述。我们当今生活中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这些快捷的信息和交流技术,领先其他所有相关技术,加速了21世纪的生活节奏,增加了人们的期望值,也使家庭和私人生活作为安全的避风港最终破灭。这些现代化工具抢占我们的时间,迫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地点都要成为工作的奴隶,本·阿格与贝丝·安妮·谢尔顿在《快速家庭,虚拟孩子》中对这些所谓当代社会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在西方,牛顿和笛卡尔出现后,21世纪的科学家们接踵而至,与“天”相关的真理被抛弃,只有相对知识被保留下来。许多关于物质世界的全新发现相继出现,思想家们在这些新发现面前成了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宇宙成了无需造物主和精神观念的进化物。科学作为新的标志代替了东方“天”的地位,同时也取代了西方上帝的位置。这个知识系统在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奥洛夫·李丁著《从道教到爱因斯坦》给了我们一个别样的哲学解读……这些也是本丛书奉献给读者们的“热点”和“看点”。

不难看出,与20乃至30多年前的文化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当今欧美学者的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经院哲学式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再

把文化研究仅仅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形式,更脱离了无休止的概念界定的窠臼。正如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所提出,文化研究的中心见解之一就是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程序化的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和明确的批评话题。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别日渐削减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无处不在。因此,文化研究拒绝对其关注的文化产品经典化,从科学到科幻,没有经典,只有异质文化形态。这股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扭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趋势。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方法模式,同时去挑战忽视其他文化形式存在的主流文化,恰恰是本·阿格等学者竭力倡导的研究路径,这个研究路径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这种看似激进的研究路径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只探询文化的差异,不再关心文化的共性,恰恰相反,他强调的只是文化研究“没有先决的方法论”,他显然已经预料到会有人指责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严格理由的文化阐释混杂方式。但他更希望人们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能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政治参与,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本·阿格无意于讨论什么是文化这样一个亘古的、带有经院哲学意味的古老话题,而是通过梳理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各种共性问题,全面论述了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核心问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中的著作,虽研究视阈有所不同,但大都体现出去经典、去学科、去单一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另一扇新的窗口。

丛书总编写在《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付梓之际

序

克里斯托夫·罗兰

李志雄，文学博士，是中国湖南省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2009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古典叙事理论》。他还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会、中国宗教协会及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会理事。自2004年始，其大学教学与科研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以及近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

作为一位精通英语的学者，他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历史与文化的探讨能促使学生关注此类研究问题。于是他着手为中国读者探求马克思与基督教的深刻关系，特别是立足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中，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成长于其中。为开展此项工作，他于2010年获得了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的立项，即《马克思与基督教关系的文学研究》。

自2012年2月到2013年1月，我担当了他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的指导教师。他是神学与宗教系的访问学者，摄政王公园学院公共室的高级成员。在他访学年内，我们进行了多次见面、讨论和共同合写文章。在我的指导下，他精读了基督教神学，特别是解放神学。经过精心细致的规划、写作和修改，我们合著的论文《希望：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的聚合与分离》发表于2013年7月的《今日神学》第70卷第2期上。在他的研究和写作中，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识和他对基督教政治神学传统的投入研究，反映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入的创新力。这个被忽视的研究课题早在几十年前曾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然则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在欧洲的学术圈里它却变成了一个少有直接兴趣的话题。但是我相信时机已经来临，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李志雄博士将有能力把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重新投入当今世界的学术领域中。

在他离开牛津的这些年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今值其著作付梓之际,欣而作此序。我为他书中所揭示的马克思与基督教的四重关系所吸引,即显在冲突、潜在融合、互补互助和交织深入。李博士力图用此四重关系为他的著作构建起支撑框架,而它们分别对应于文学的本质、过程、价值和功能。

特别有吸引力的是,他在研究中探究了一系列的话题,适合于采用政治、哲学和神学的资源,也适用于文学的问题。本书全然是跨学科的研究。他所建构的文学理论是与非文学问题相互作用的,而非文学问题常被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所低估。然则,非文学问题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有价值的资源。进而,他的文学理论是实践性的,是针对中国处境而提出的真正问题。对由意识形态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之间的纷争,李博士重构了文学研究,目的在于应对此瓶颈问题。他探究了文学与审美,以期突破此阻碍。从实践上来讲,他的文学研究对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则阻碍了社会发展。他以丰富的参考资料和辅助性的文献来支撑此观点,其结果是具有逻辑性的建构。我认为,他成功地向中国读者阐释了马克思自身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而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此文化背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非宗教性”而不是变得“反宗教性”的论述上,李博士又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解放神学,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融合的积极产物。总之,他另辟了一条渠道即文学和美学来详解马克思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我热诚欢迎李志雄博士的研究。他展现了作为研究者的创新力和胜任力,以及作为对话者的实效和诚恳。我向他介绍了这个话题中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方面,指出了它被忽略的层面,即多数主流神学和宗教研究,也确实是人文研究更普遍倾向于忽视的东西。我毫无保留地举荐李志雄博士,作为一名学者,以他良好的语言和智力资质,能够推动英语和汉语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

克里斯托夫·罗兰

牛津大学荣誉退休爱尔兰院长圣经释经学教授

Foreword

Christopher Rowland

Li Zhixiong is a doctor of litera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Human Province, China. In 2007, he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nd in 2009, he published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ristotle's Classical Narrative Theory*. He is also a council member of China Marxist & Leninist Literary Theory Association, China Religion Association, and of Hunan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His university teaching career since 2004 has included courses o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re recently the study of Marxism and Christian culture.

As a scholar proficient in English language, he has found that a historical or cultural exploration of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has enabled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Hence he has set out to explore the depth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x and Christianity for the Chinese rea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occidental milieus where most Chinese readers do not grow up themselves. In pursuit of this task, he secured a general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anted by China Education Ministry in 2010, namely: *A Liter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Marx and Christianity*.

From February 2012 to January 2013, I acted as his adviser when he had his academic visit in University of Oxford. He was an

academic visitor, in the Faculty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 and a member of the Senior Common Room Member, Regent's Park College. During his visiting year, we had numerous meetings, discussions and paper working together. He had an intensive reading of Christian theology, especially liberation theology under my guidance. After careful planning, writing and revising, we co-authored an article, 'Hope: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Marx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which appeared in *Theology Today*, Volume 70, Number 2, July 2013. His knowledge of the Marxist tradition and his engagement with the Christian political theological tradition has always reflected a deep insight and creativity in both his research and writing. This neglected subject was a live issue several decades ago but with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 it has been of less immediate interest in scholarly circles in Europe. But I believe that its time has come, and I am glad that Dr Li Zhixiong will be able to put a subject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nce again in the scholarly map.

In the years since his departure from Oxford, we have kept in touch. Now his book is published. And I am very glad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it. I am struck by the four relationships of Marx and Christianity suggested in this study, namely, overtly contradictory, covertly integrated, mutually complemented and helpful, and deeply interlocking and synthesized. Dr Li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his monograph by using four relationships which correspond with the essence, process, valu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What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at he has explored in his study a range of subjects, appropriately taking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or theological resources as well as literary issues. In his book he has been thoroughly interdisciplinary. The literary theory he has proposed is a dynamic one related to non-literary issues which are often underestimated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studies. However, the non-literary issues are significant resources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 What is more, his literary theory is a practical one regard to real questions raised in Chinese situation. Dr Li has reformulated a literary study which aims to deal with the bottleneck in debates between Marxists and Christians caused by the subject of ideology. He has explored th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to break through this blockage. Practically, his literary study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harmonious situation in China where ideological disputes between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have hindered social developments. The result is logically structured with plentiful reference to secondary literature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I consider that he has been successful in explaining Marx's own Judeo-Christian inheritance for Chinese readers, who may not be aware of this cultural background.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Marx's "irreligiosity" rather than him being "anti-religion", Dr Li then introduces liberation theology which is a positive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ristian theology to Chinese academia. In sum, he opens up a different road to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s of Marx and Christianity, namel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 warmly welcome Dr Li Zhixiong's study. He has shown himself a creative and competent researcher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and cordial dialogue partner. I have introduced him to thos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of which he may not have been aware and to indicate neglected dimensions of the subject, which much mainstream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research, and indeed the Humanities more generally, tends to ignore. I recommend without reservation Dr Li Zhixiong as a scholar who is well equipped linguist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to promo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Christopher Rowland is Emeritus Dean Ireland's Professor of the Holy Scrip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

前言

本著作的研究缘起可以回溯到 2004 年,自那年始,我在湘潭大学讲授《马列文论》课程。众所周知,这样的课程,可被称为“硬骨头”。一方面,我国的大学或研究生教育体制把“马列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马克思、恩格斯文学论著选读”等名称的课程划为文学类专业的主干或基础课程;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灌输学生思想的偏颇做法,使得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这样的课是很不好教授的。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及它的文艺理论思想可说是汪洋浩瀚、博大精深、渊源绵长乃至桀骜难懂,譬如,它的脚在 19 世纪的德国,但它的头却在公元前 12 世纪的古希腊;它唱的白脸是“反宗教”,但它的一颗红心与“犹太—基督教”的历史文化传承不可分离。由此,教者亦难,学生亦苦。这其中特别令我焦躁不安的是:当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为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儒家文化所浸染的研究者、作为自觉不自觉肩负“文以载道”的人民教师,我们是否真正弄懂了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

推动以上困惑性或反思性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因却是在 2008 年,那年我连续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自 2004 年以来持续主办的“人文学与神学”暑期国际研讨班,这样的暑期班与一般的学术会议或培训不同的是,一是它的国际性,邀请了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来华讲座,提供了中国学者直接与国外专家对话的良好通道;二是它的专业性,它的学术问题总是围绕“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主题来开展,具有启发性和前沿性。正是在此次暑期班闭幕式上,杨慧林教授倡议下一届(第六届人文学与神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神学”。我当时听了很振奋,因这正是我想要探究的问题,也希望知道其他的学者和专家是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还是困惑,因按照一般通俗

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神学是对立冲突的,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融合在一起呢?

接下来是两年的摸索期和初步行动期,构成了本研究的初步试验。2010年7月底到8月初,经过一年多的磋商和协议,我作为联系人和组织者之一,促成了第六届人文学与神学暑期国际研讨班在湘潭大学举办,合作双方是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此次研讨班会议的主题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人文学和神学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大范围来讨论,但我为参会所提供的论文《剑与十字架:人文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比较》所谈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与神学问题,我与来自美国贝勒大学的谢大卫(David Jeffrey)和丹尼尔·威廉斯(Daniel Williams)教授有过多次交流和探讨,因为他们为参会所提供的论文分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交锋”和“重新认识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的问题,这使我看到了西方学者在他们本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真实处境和微妙关系,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是还原到马克思或恩格斯当时或背后的历史文化处境,则可能是诧异的、困惑的甚至是误解的。之前,在湘潭大学的韶峰博士论坛上,我就这个主题为师生做过讲座,引起了关注、兴趣乃至不解。但这本身就是好事情,如果对这一问题大家都理解了,则没有必要再探讨。

如果说一个深奥而复杂的学术问题是必定要费尽辛苦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年成了我探究这个问题的深入期和逐步收获期。2011年7月到8月,我利用暑假参加第28届马列文论年会和第七届人文学与神学暑假班的空隙,在国家图书馆呆了近两周的时间,复印了囊括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方面外文原著26本。使我感到惊喜的是,对西方世界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备受争议和排斥的问题;使我失望的是,这些现有的论著中存在着一些大而空的泛论,没有落到实处。而2012年对我来说,则是一个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转变期,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发现和落实。这年2月初到2013年1月底,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到英国访学一年。经过近10个月的反复联系和商议,我的访学单位最终确定为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系。选择牛津大学,并不是看重它的名气,关键是,这座有着1200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其源远流长的宗教

研究和神学资源是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所难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合作导师是克里斯托夫·罗兰(Christopher Rowland)教授,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解放神学”研究专家。解放神学融合和借用马克思主义,挑战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在西方特别是在拉美地区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接下来的一年的访学期间,既漫长又短暂。漫长的是痛苦的思索和探究,短暂的是快乐的投入和专注,回想昨日,时不我待,无论是与合作导师的磋商和探讨,还是会议与课堂上的发言、提问和争论;或是在图书馆漫长的学习时日;或是清晨读书的连页笔记。忘不了初春时节在伦敦寻觅马克思当年的故居和瞻仰他远落郊野的墓地;忘不了盛夏时节在曼彻斯特工人运动纪念馆的流连忘返;忘不了仲秋时节在柏林大学和特里尔寻访马克思的足迹;忘不了在隆冬时节我带着这份长年的思考和收获回到祖国……

人们禁不住要问,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到底有着什么神秘的关系。现在看来,实事求是地说,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这本薄著所难以回答完全的。因而,我有意把这个问题具体化,确定为马克思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也即探询一位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诗人、文艺批评家与他生活其中的作为文化处境的基督教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大而概之,则是探询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依据常识,西方文明源自“两希文明”。古希腊文明对马克思的影响众所周知,而希伯来文明与马克思的关系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可能还不太清楚。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或具有较高文化才形成的,因而破解一个复杂问题宜从较低形态入手,所以本研究就从基督教文化入手。尚且,古老高雅的希腊文明并不处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马克思生活其中且现实地要打交道的是基督教文化,因而毋宁说,马克思作为19世纪的西方人,其实际意义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问题的纠结是:人与实际意义、生活性或平常性的文化的关系往往是看似简单而明白,但却复杂而微妙。

进而,人们还会禁不住要问,既然是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你是如何来探讨的?我要说的是,与前人和他人所不同的是,我要从一个简易而实在的维度——文学来探询这个问题,道理也很简单,较之其他学类,文学极具情感性、通融性和宽泛性,由此探询,就可避免陷入僵局和死角。马克思为之终生奋斗的人类理想是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萌芽却是在原始基督教